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

曾宪通 主编

杨泽生 著

战国竹书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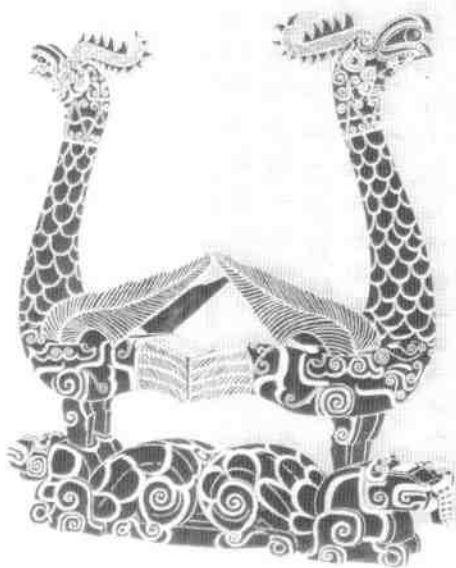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

曾宪通 主编

杨泽生 著

战国竹书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竹书研究 / 杨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2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 / 曾宪通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3236 - 9

I. 战… II. 杨… III. ① 竹简文—研究—中国—战国时期
② 汉字: 古文字—研究 IV. K877.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768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裴大泉

责任编辑: 裴大泉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校对: 刘丽丽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4.5 印张 341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8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曾宪通

本丛书所谓的“古文字”，主要是指通行于先秦时期的古汉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兼及秦至汉初的小篆和保留篆书写法的篆隶等；本丛书的“出土文献”，则是特指以这些古文字为载体的地下文献资料。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对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专名。然而，从二者的含义有广狭、出现的时间有先后来看，却反映着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演进。

古文字之称肇始于汉代，汉人用以指称汉以前的先秦文字，故又称为古文或古字。根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汉代所谓的古文一般指汉时所存之先秦文字，大抵有四种含义：一指彝器铭文，如《汉书·郊祀志》言“张敞好古文字”，又载美阳得鼎，敞议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与《说文·叙》谓鼎彝之铭“皆前代之古文”同。二指先秦写本旧书，如《史记》所记秦柱下和石室金匱之书，以及《五帝德》、《帝系姓》、《孔氏弟子籍》和《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等，都是先秦六国遗书。三指孔子壁中书，如《说文·叙》记亡新“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四指古文经学派，如《汉书·地理志》凡地名下说解云“古文以为某”者，此处古文非以文字言而以学派言之也。其中一、二项皆指先秦古文字，第三项指壁中书的书体，第四项则是由于研究壁中书的古文经而形成的古文经学派。可见古文字即古文之名，由原本指文字、书体之名，引申之而为学派之名。但综观有汉一代，彝器铭文仅美阳所出尸臣鼎等少数记载而已；许慎《说文·叙》中虽提及“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然许氏不能一一目验，又无拓本可致，故《说文》全书并未曾征及铭文一字。及至东汉，古文一名遂由壁中书所专。其后魏正始刊立石经，中有古文。晋太康二年有汲冢竹书出土，其性质类于壁中书，亦属古文一系。至北宋初年郭忠恕集古文七十一家成《汗简》一书，随后夏竦又增益之成《古文四声韵》传世。由此可见，自汉至宋古文字概称为古文，乃指汉人所传的先秦写本及其辗转传抄的先秦文字，今人谓之传抄古文，是为古文字含义的第一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所谓出土文献，是指因种种原因埋藏起来而被重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与前代未被埋没相传至后世的传世文献有

所不同。汉初上离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远，典籍异常匮乏。汉高祖戎马一生，关心的是打天下和坐天下的事。至惠帝始解除挟书之令，武帝更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到西汉末年，社会上收藏的古书便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发自中秘，如毛氏《诗》、费氏《易》、左氏《春秋传》等；二是得自孔壁，如《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三是献自民间，如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等。按照后人的观点，发自中秘者应属于传世文献，得自孔壁者应属于出土文献，献自民间则二者兼而有之，它们都属于汉人所见的古文经，而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有所区别。可是这些古文经的价值，只是到了刘向父子校理中秘书时才被发现的。自此形成了贯穿整个汉代学术史的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学派之争。对于古文经学派而言，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没有本质差别的；而对于今文经学派来说，更加不会去深究二者之间的异同。由此可见，早期的出土文献指的是汉人所传的古文经，它实际上涵盖了传世的先秦写本和被发掘出来的先秦写本在内，《说文》中的古文，当是来源于这些先秦写本的文字，而魏三体石经的古文和郭忠恕、夏竦书中的古文，则是这些先秦写本所用文字的变体。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宋代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古文字之名基本上为“钟鼎彝器款识”或“吉金文字”所代替，前者又称为“钟鼎文”，后者则简称为“金文”，并且沿用至今。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比较集中在青铜器的图文方面，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摹录青铜器的图像和文字，如《宣和博古图录》和乾隆“四鉴”等。二是专门集录青铜器铭文，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啸堂集古录》、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澂《窰斋集古录》和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等。三是仅有器名、释文或跋语的，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以及散见于宋人的笔记、小说等。但这种形式只见于早期，后来便十分罕见。北宋是我国金石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士大夫阶层中收藏、鉴赏和研究古代器物的风气便盛行起来。经过北宋庆历之际理学思潮和经学流派的洗礼，古器物的研究由文字而及于礼制和史实。又经清初乾嘉朴学的影响和“小学”研究的推动，文字由字形的辨识和字义的训释而及于铭文的通读。至晚清同光时期，潘祖荫、陈介祺鉴别精严，吴大澂、刘心源精于字形辨析，方濬益、孙诒让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且熟悉典籍，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相印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都为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个时期是自20世纪开始至今，以清末殷墟发现甲骨文为契机，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走上了全面成熟的发展道路，在纵深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飞跃进展。具体表现在“古文字”这一概念有了明确的对象和范围，从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已逐渐形成了殷商周初甲骨文、先秦青铜器铭文和战国文字（含传抄古文）三个分支，以及秦至汉初保留篆隶写法的简帛文字。同前两期比较，第三期的古文字和出土文献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空前丰富。如前所述，汉人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以先秦写本的古文经为主，自宋至清则以彝器铭文为大宗。20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古文字材料，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虽然出土的陶符、陶文是否属于汉字的原始阶段尚存在

争议，但自商代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代和西汉前期，在考古年代学上的每个时期，都有以当时书写材料为代表的文字资料发现，已构成一个以象形、表意为基础的古文字到以表意、表音为主体的近古文字及其向篆隶过渡的发展系列。从这个系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字形成体系之后从古文字发展到今文字的整个过程，中间没有任何缺环。这些完备的资料正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是科学的识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应当承认，西汉上离先秦未远，汉人认识古文字的水平应当是很高的，张敞对尸臣鼎所作的三十二字释文，今天看来仍基本正确，就是明证。宋清两代对古器物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但识字水平则远不如汉人。由于受到当时理学和经学的影响，过分追求义理而又缺乏阙疑的精神，在许多重要的关键字还来不及正确释读的情况下，便急于联系经传，随意发挥，结果难免流于比附。直至晚清吴大澂、孙诒让开始用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考释古文字，才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20世纪上半叶唐兰先生等一批古文字学家，自觉运用吴、孙之法而加以发扬光大，获得很大的成功。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新材料特别是战国文字材料的不断涌现和旧资料的系统刊布，科学的识字方法经过实践的不断验证已为多数学者所确认和掌握，学者群中整体的识字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现在，一批批的新材料一经公布，经过一个“争议期”的热潮之后，表层次的识字问题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属于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证明。

第三是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更加明确。汉人对古文字资料完全没有时代观念，今文经学派以为“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错误地认为古今文字一成不变，不可改易。古文经学派虽然重视先秦写本的材料，但对古文看法却相当含混。只是到了王国维将它与出土的战国文字相比校，发现他们原是“一家之眷属”，并指出其为战国时的“东土文字”之后，关于传抄古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才明确起来。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作《两周金文辞大系》，通过标准器系联法将大量传世和新出的青铜器编联起来，使宗周与列国的金文材料有了明晰而系统的时空序列。建国以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首先将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作为第一要务，进而推及整个古文字学科各个领域，使古文字资料的时代观念更加明确。而大批经科学发掘的出土资料，更大大丰富了分期断代标准的科学性。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涌现，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也盛行起来。现在，一有新材料发现，学术界首先关注的是其年代和地域的问题。同一道理，如果一种古文字资料的时地问题未解决，就会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甚至会影响到它作为科学研究的价值。这已成为当前学界的共识。

第四是对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正在形成。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王国维过去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的材料”，主要指用地下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实物资料，来证明古书上的记载。并预期“中国书本上的学问，有赖于地底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发现的文字资料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于竹帛的古书越来越丰富，故有学者提出将地下发现的文字资料同遗址、遗物等加以区分的“三重证据法”。这样，文献学的成分就更加突出了。第二个层面对出土的文字资料分别从历史、哲学和语言文字的不同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站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高度，构建人类早期的文明史。这当然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创举。但是这项基础工程的基础工作就是语言文字学自身的本体研究，即注重从古文字的字形入手，联系词的音义，清楚而准确地阐释出土文献的内涵，进而揭示出土文献在思想、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综合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为了对古文字和出土文献进行语言文字学的本体研究，我们在平时研习和治学的过程中，比较自觉地强化用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和文化学的意识去审视出土文献，并且形成了若干专题，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究，先后完成了若干专篇。在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以丛书形式结集出版，名之曰“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名目分别是：

-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丛考》（曾宪通）
- 《简帛典籍异文研究》（吴辛丑）
- 《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刘乐贤）
- 《战国竹书研究》（杨泽生）
- 《战国楚金文形体和词汇综合研究》（张连航）
- 《金文考释的历史考察》（裴大泉）
- 《古楚语词汇研究》（谭步云）
- 《战国秦汉简帛词语通释》（陈伟武）
- 《秦及汉初句型研究》（郑刚）
- 《古本〈尚书〉文字研究》（林志强）
- 《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陈斯鹏）

总计有十一种之数。笔者相信，随着出土材料的陆续刊布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这套丛书的研究课题必将有新的拓展，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必然有所更新，这是可以预见到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固然会勾起自己多年来同友生们一起切磋琢磨的美好回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前瞻，为了展示年轻人的阶段性成果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新材料不断涌现的今天，正是年轻人生逢其时的大好机遇，时代的重任正历史地降落在新一代人的肩上，这就要求年轻人在新的条件下积极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开拓，敢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新的高峰！

2002年9月于珠江南岸康乐园

目 录

总序	曾宪通 (1)
零 引言	(1)
壹 绪论	(3)
一 中国历史上的竹书	(3)
(一) 竹书的名称、含义和形制	(3)
(二) 竹书的起源与流传	(4)
(三) 竹书的历史文化地位	(6)
二 古代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	(11)
(一) 孔壁竹书	(11)
(二) 汲冢竹书	(12)
(三) 其他竹书	(14)
三 现代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	(17)
(一) 长台关竹书	(17)
(二) 九店竹书	(18)
(三) 放马滩竹书	(19)
(四) 慈利竹书	(20)
(五) 郭店竹书	(22)
(六) 上博竹书	(23)
(七) 其他竹书	(24)
四 研究战国竹书的方法	(29)
贰 长台关竹书研究(四篇)	(36)
一 “民”字考释	(36)
二 文字风格的横向比较	(39)
三 38 号和 3 号残简考释	(44)
四 学派性质新探	(50)

叁 郭店竹书研究（七篇）	(58)
一 《老子》考释（六则）	(58)
（一）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	(58)
（二）孰能所以动者将徐生	(60)
（三）执之者远之	(61)
（四）为而弗志	(62)
（五）有状蟲成	(64)
（六）甲于累土	(65)
二 《太一生水》“成岁而𠄎”和楚帛书“𠄎以为岁”	(68)
三 《缁衣》中的“言不𠄎行”和“𠄎以行”	(73)
四 《唐虞之道》考释（两则）	(78)
（一）身穷不𠄎，𠄎而弗利	(78)
（二）二十而君	(80)
五 《忠信之道》考释（两则）	(82)
（一）𠄎而者尚	(82)
（二）群物皆成而百善𠄎立	(82)
六 《成之闻之》考释（两则）	(86)
（一）民可敬导也，而不可𠄎也；可𠄎也，而不可𠄎也	(86)
（二）智而比即	(88)
七 《语丛》考释（七则）	(92)
（一）有喜有怒，有𠄎有庄	(92)
（二）求者，无有自来也	(95)
（三）处而无𠄎习也，损	(97)
（四）彼邦毋𠄎，流泽而行	(99)
（五）车𠄎之𠄎𠄎，不见江湖之水	(101)
（六）必尽其古	(103)
（七）山无𠄎则𠄎	(104)
肆 上博竹书研究（十篇）	(111)
一 关于《孔子诗论》“孔子”合文的释读	(111)
（一）前期对“孔子”合文的释读分歧	(111)
（二）后期对“孔子”说的充分论证	(118)
二 关于《孔子诗论》2号简中的两个怪字	(126)
三 《孔子诗论》8~10号简零释	(132)
（一）其言不𠄎，小有𠄎焉	(132)
（二）《天保》其得禄𠄎疆矣，𠄎𠄎德故也	(135)
（三）终而皆𠄎于其初者也	(136)
四 说“既曰‘天也’，犹有怨言”评的是《邶风·柏舟》	(138)

五 关于“中氏君子”的释读	(144)
六 《缁衣》考释（三则）	(149)
（一）为上可系而知也	(149)
（二）心以体存，君以亡 亡	(151)
（三）彖也大成	(153)
七 《民之父母》杂释（三则）	(155)
（一）“亡”字作亡的特殊写法	(155)
（二）彖矣，宏矣，大矣	(157)
（三）内恕而悲	(158)
八 《子羔》考释（三则）	(160)
（一）有虞氏之乐正 何 之子也	(160)
（二）抑尧之德则甚明欤？孔子曰：钩也	(163)
（三）等而和	(164)
九 《从政》考释（三则）	(167)
（一）而终取之	(167)
（二）志气不旨	(168)
（三）小人先人则 受 之	(169)
十 《容成氏》考释（五则）	(171)
（一）其德酋清	(171)
（二）长者酥宅	(171)
（三）以亵四海之内	(174)
（四）自为芑为恶	(175)
（五）而得失行于民之唇也	(176)
伍 孔壁竹书研究（一篇）	(179)
孔壁竹书的文字国别问题	(179)
结语	(186)
引用论著简称	(188)
主要参考文献	(190)
后记	(210)

零 引 言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献中，简帛文献最为大宗。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内容性质主要分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还有书札、历谱、遣策和卜筮记录等。由于内容性质不同，简帛书籍和其他类别在研究的方法途径上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学者主张将它们分开来进行研究^[1]。简帛书籍按其年代又可分为战国、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四组^[2]，其中战国一组年代最早，学术价值非常高，其文字又多与其他三组有较大差异。而从书写材料看，简和帛根本不同，简也有竹简、木简之别。鉴于战国帛书只有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时代早，数量也少，学者研究比较多；而现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均为竹简”^[3]，换言之，已发现的战国简帛书籍除了子弹库楚帛书，就都是战国竹书，因此，将战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行和必要的。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是王国维在 20 世纪 20 年代讲的一个名言。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四项“最大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4]，“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5]，于此可见王氏的远见卓识。从 1949 年以来的 50 多年中，中国的许多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也都很好地证明了王氏的深刻见解^[6]。特别是，从 1972 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等大批竹书到 2002 年的整整 30 年中，在中国大地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简帛文献。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重要，大概是王国维在世时所不敢想象的。而影响特别深远的要数其中的书籍类文献，尤其是近十年里出土发现的属于战国时代的郭店竹书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竹书（本书简称为“上博竹书”）。随着郭店竹书的出版和上博竹书的陆续公布^[7]，相关的研究已很快成为热潮，而且这个热潮还将持续并且可能升温。

因此，我们在大量的简帛文献中将战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可谓恰逢其时。陈寅恪先生在 1930 年发表的《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8]如此说来,我们对战国竹书这些古旧东西的研究,竟然也可以称得上符合新潮流的。当然,我们并非刻意追赶什么潮流,而是这些战国竹书本身所具有的许多已知和未知的丰富内涵及其重要价值,深深吸引着我们,借用胡文辉先生非常平实的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东西在那里,因为问题在那里”^[9]。所以,郭店竹书和上博竹书能吸引诸多学者参与研究并有大量论著涌现出来,这是极其自然和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个人的研究有所收获、有所贡献,必须“各就其治学范围”,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要使整个新出材料的研究和整个学科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必须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对各种研究成果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审视总结。值得注意的是,郭店竹书和上博竹书等新出战国竹书对50年代出土的长台关竹书的研究,甚至对孔壁竹书、汲冢竹书等古代发现的战国竹书的进一步研究,也都很有帮助;而增加对古代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的了解,也可以深化我们对新出战国竹书的认识。因此,在新出战国竹书研究的热潮当中,本书打算将历代(包括古代和现代)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进行必要的梳理,对研究战国竹书的方法进行一些思考和总结,在我们自己的“治学范围”内,以语言文字为中心,对战国竹书中的部分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 [1] 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文物》1999年第10期38页。
- [2] 同注[1]40~41页。
- [3] 米如田:《战国楚简的发现与研究》,《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65页。2002年湖南龙山的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出土了36000余枚简牍,据介绍,“J1出土简牍均墨书,绝大多数为木质,只有第⑤层的楚简是竹质。楚简均残断,仅一枚是在不规则的方形木条上书写”,该木条写着“布四敦(寻)”等几个字(参看本书130页右上图),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的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18页;该木条正面和背面的图像见10页图七和9页图六,简报作者没有称之为木简。
- [4]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99、700页。
- [5] 同注[1]。
- [6] 参看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4~17页;何双全《中国简牍的世纪综述》,《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28日和2002年1月2日、11日、18日、25日、2月8日第7版连载。
- [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后面简称《郭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后面简称《上博一》、《上博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2002年12月。
- [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 [9] 胡文辉:《搞那些东西有什么用?》,载《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369页。

壹 绪 论

一 中国历史上的竹书

中国竹书有漫长的历史,战国竹书只是其中一个发展阶段。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大量的竹书,而本书研究的历代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为了更好地认识战国竹书的面貌、地位和价值,为了更好地理解研究战国竹书的方法,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整个竹书家族的大体情况。

(一) 竹书的名称、含义和形制

竹书的名称出现较晚,大概从汲冢竹书发现后才开始使用并广为流播。比如《晋书·束皙传》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1]《荀勖传》说:“及得汲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2]两传共有三处提到“竹书”。此外还有多种文献提到竹书,用来指称书写于竹简上的书籍^[3]。同时,这批汲冢竹书还被称作“册书”、“书册”、“策书”、“竹简书”、“竹策之书”等^[4],可见竹书的异名别称比较多。

汲冢竹书包括《纪年》、《易经》、《穆天子传》等十六种著作,其中《纪年》又通称《竹书纪年》。此后学者说到竹书的“书”,一般采用狭义,专指《纪年》、《易经》那样的著作,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韩子皆著书”的“书”意义相同^[5],与《汉书·艺文志》等目录学著作所列的“书”相类。研究书籍史的学者说,正式的书籍“是指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态的专用材料上以借人阅读为目的的著作物”^[6]。可见,“书”指著作,这是学术界的一般看法^[7]。因此,一些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献,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楚简中的遣策和占卜记录,汉简中大量的文书和簿籍,实际上并不能算作“书”^[8]。

竹书的基本形制,是在经过整治加工的竹简上用毛笔蘸墨书写,然后编连成册。竹

简的整治加工,主要是先“截竹为简,破以为牒”^[9],然后“杀青”、“汗简”^[10]。北宋初年郭忠恕编的古文字典以《汗简》为名,正是因为其收录的古文主要来源于历次发现的先秦竹书^[11]。制作竹简和刮削错字都使用刀子,但竹书上的文字不是用刀刻而是用毛笔蘸墨书写出来的^[12]。“简”和“册”区别明显。《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策,简也。”似乎将“简”与“策”混同,但贾公彦并非“疏不破注”,他说:“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简者未编之称……策是其众简相连之名。”^[13]引文“策”是“册”的假借字。“册”字甲骨文作、等形,金文作、、等形,小篆作,都像用绳将简编连成册之形;字形当中的编绳即《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而“韦编三绝”^[15]的“韦编”。“韦编”过去解释为“熟牛皮绳”,但无论古代发现的竹书还是现代出土的简牍,用以编连的都是丝绳或麻绳^[16],所以商承祚先生把“韦编”读作“纬编”^[17],指竹简上的横编,这应该是可信的。由于竹书编连成册,卷着收藏,所以“篇”、“卷”、“册”成为书的量词^[18],而“册书”、“书册”或“竹策之书”成为竹书的别称。因为竹简体积较大,一部竹书往往由许多篇卷构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19],篇幅大的如《虞初周说》有943篇,《汉著记》有190卷^[20];当然也有篇卷少的,如《孝经》、《弟子职》等书只有1篇,《泰阶六符》只有1卷^[21]。《汉书·司马相如传》说:“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22]可见,古代不论篇卷多少,只要是文章或著作都可以叫做“书”。再者,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23],所以竹书之“书”与现代的书有所不同。

(二) 竹书的起源与流传

竹书的起源与流传,可以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源远流长”。

前面提到的汲冢竹书是战国时候魏国的东西,现在我们见到的竹书也以战国为最早,但是竹书的源头应该远在战国之前。《尚书·多士》载周公训诫殷商的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伪孔安国《传》:“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说殷改夏王命之意。”^[24]学者多据此认为,商代初年就已经有了“册书典籍”^[25]。“殷革夏命”的史实就记录在殷人的典册中。商周两代有叫做“作册”的史官,甲骨文“册”字像“竹木简编组成册之形”,这确实能证明“商代已有简册”^[26]。至于商代简册的书写质料主要用竹还是用木,或者竹木兼用,由于没有实物遗存,难以证实^[27]。但是我们在前面引言中说过,现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均为竹简;秦汉时代的简册也以竹质为主,在不产竹子的地方或竹材缺少的情况下才常用木简^[28]。而在上古时期,北方许多地方都有竹子生长。正如竺可桢先生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29]。《吕氏春秋·古乐》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30]传说作于黄帝时候的《弹歌》也说“断竹续竹,飞土逐穴”^[31],这说明竹子在黄帝时候有广泛的分布和用途。在商代,“中原地区气候温和,盛产各种竹子”^[32]。这就为书写用的竹简取材带来了便利。而殷墟甲骨文已形成的书写行款不是横向从左到右而是纵向从上到下,许多表

示动物的象形字不是四脚立地而是四足腾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也是竹简的大量使用^[33]。因此,商代的典册大量使用竹简是可以想见的。钱存训先生也说“虽然‘简牍’已成为一个名词,竹木的使用也相提并论,但最初用以书写的材料,相信是竹简而非木牍”^[34]。所以我们认为商代就有了竹书,这应该是竹书产生的下限。

至于商代之前有没有竹书只能进行推测。前引《尚书》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其中的“殷先人”通常理解为“殷革夏命”之后的殷人祖先,如果包括“殷革夏命”时候或者之前的殷人祖先,那么在夏商之际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也许就有了竹书^[35]。《逸周书·文传解》两次引到《夏箴》这部书,孔晁注说是“夏禹之箴戒书”^[36]。陈炜湛先生曾根据《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八引《吕氏春秋·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37]指出“夏桀有‘太史’,有‘图书’”^[38],这在时间上与早商时候已有竹书的推论相合。《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楚国的良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39]伪《尚书序》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40],而《说文·丌部》说“典”为“五帝之书”^[41],结合前引黄帝时候与竹子有关的记载,这些传说中最古的典籍似乎也可能是竹书。

竹书的出现和流传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长时间作为中国文化积累、创新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堪称文化功臣。尽管由于保存条件和埋葬习俗方面的原因,商代、西周和春秋的竹简还没有发现^[42],但它们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裘锡圭先生说,“商代典册的内容无疑会比甲骨文、金文更为重要,文字篇幅也一定会更长”^[43]。《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八引《吕氏春秋·先识览》说:“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纣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奔于周。”^[44]所说“图书”、“图法”大多应该属于竹书,而商、周两代分别继承和收藏了其前代的部分竹书。杜预《春秋序》中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45]可见,不仅周王室有竹书,各地诸侯也有竹书。不过,周代以前的竹书大都为公家史官所为,而私家著述可能是从春秋时候孔子才开始,在战国时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46]。所谓争鸣大概并不是文化人聚在一起辩论争吵,而更多时候应该是通过竹书这个载体来进行。《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47],可见当时著书藏书之盛。

当然,竹书很占空间,难以保管,再加上天灾人祸,所以它们在历史上的残缺散失也相当严重。正如《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48]春秋周敬王四年,王子朝作乱失败,曾“奉周之典籍以奔楚”^[49];到了战国时期,周分为东、西周,西周、东周又先后于公元前256、前249年被秦所灭,以竹书为主的典籍无疑会大受损失,秦驷玉版说“周世既没,典法鲜亡”应该是实情。这是周王室的情况,而诸侯国的典籍也损失严重^[50]。比如《汉书·艺文志》说:“及周之衰,诸侯将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51]《说文·叙》也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52]就秦国而言,其焚书并非从秦始皇才开始,如《韩非子·和氏》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53]到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促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全部照准^[54]，为此而制定的律文就是有名的《挟书律》，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才得以解除^[55]。李学勤先生指出，“《挟书律》的执行，虽然仅有二十多年，但给学术文化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56]。可以认为，秦以前的很多书籍因此而失传了^[57]。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更显得珍贵难得。

虽然有些竹书的散失永远无法弥补，但是汉人在收集、整理前代书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竹书在两汉时候仍然继续流行和繁荣也是毋庸置疑的。不用说《汉书》、《后汉书》等古籍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就是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许多出土的两汉竹书^[58]。纸虽然很早就出现了^[59]，但是大约到东晋末叶（4世纪）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才开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写材料^[60]。因此，竹书的使用和流传至少延续到4世纪。于此可见竹书的源远流长。

由于竹书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也由于竹书难以保存，所以我们现在见到出土的竹书，相对于曾经出现过的竹书来说，应该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而就出土发现的战国竹书来说，更是如此。

（三）竹书的历史文化地位

在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前，由于取材和制作的便利，竹简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占主导地位。这期间的书籍自当以竹书为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竹书的重要历史文化地位。

大概从春秋开始，除了竹书之外，还有帛书的流行。《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齐桓公封狐、谷两地给管仲，“著之于帛，申之以策”^[61]。《墨子·尚贤下》、《明鬼下》和《兼爱下》、《天志中》分别提到“书之竹帛”和“书于竹帛”、“又书其事于竹帛”^[62]，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简册和帛书并行的反映”^[63]。而所谓“并行”，应指两种书写材料在当时一起使用。缣帛虽然比竹简轻便得多，“但是也贵重得多，作为书写材料大大不如竹木用得广泛”^[64]。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古代的帛书一直很少发现，有影响的只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和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两宗，而竹书在古代和解放后都有大量出土。前引《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是成语“学富五车”所本，而“五车”所载也应该是竹书而不是帛书。因此，《墨子》将“竹”置于“帛”前，除了竹书比帛书出现早的因素之外，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竹简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韩非子·安危》说“先王寄理于竹帛”^[65]，《史记·孝文本纪》说“著于竹帛”和“著之竹帛”^[66]，《汉书·艺文志》说《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67]，都说明同样的问题。

李学勤先生曾说战国时候的“北方列国，可能和汉代一样通行木简和竹简两者，甚或专用木简”^[68]。米如田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东周时期中原列国也应以使用竹简为主。两汉的木简主要发现于西北的军事要塞”^[69]。尽管古书有“秦篆无以穷

书，楚竹不能尽载”^[70]的说法，但是有关古代气候与竹子生长的研究表明，从战国到东汉初，“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几近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71]。这说明可能使用竹简的区域是非常广泛的。有学者说，“我国古代书写的主要材料是竹木，因为价廉，又到处都有，故被广泛使用，而竹子尤普遍”^[72]。竹子“更因为其轻巧及表面的光滑，在纸发明以前，竹乃被古人选为书写的主要材料”^[73]。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竹简比缣帛、木简用得广泛普遍，其影响也更为深远。成语“罄竹难书”是个很好的说明。《说文·竹部》说：“箒，书僮竹笞也。”“笞，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笞。”^[74]可见古代孩童常用竹片习字。缣帛珍贵，木简的制作又比竹简困难^[75]，因此，习字孩童用竹片作“练习本”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说文·竹部》：“篆，引书也。”“籀，读书也。”“篇，书也。”“籍，簿书也。”“范，法也。从竹，竹，简书也；汜声。古法有竹刑。”^[76]这颇能说明竹简跟书籍和读书写字的关系。《说文》“典”、“册”二字古文都从“竹”作箒和簠，“侖”字的籀文簠的“册”旁也从“竹”^[77]，说明古代的简册是以竹简为主的；《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78]并非虚言，这恐怕也是“竹书”之名出现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饶有兴味的是，战国时代的“书”字大都写作从“竹”的“箸”^[79]，这应该反映了人们长期以竹简为书写材料，而书籍以竹书为主的状况。

我们祖先长期以竹作书，主要通过竹书来播撒着文明的种子，并由此创造和积累了丰厚灿烂的文化。而竹书的笨重与厚重，大概对造纸术在中国的发明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竹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加强对竹书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竹书——战国竹书的研究，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 [1]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册1432~1433页。
- [2] 同注[1]第4册1154页。
- [3] 此外，《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引傅畅《晋诸公赞》等都提到汲冢“竹书”，郦道元《水经注》在“纪年”、“穆天子传”前或冠以“竹书”之名（参看陈梦家《汲冢竹书考》，载《六国纪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7~118、127页）。
- [4] 参看注[3]《汲冢竹书考》117、118页引《书断》、《史记·周本纪》正义、《晋书·卫恒传》、《隋书·经籍志》、《齐大公望表》等。
- [5]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7册2155页。《史记》等书很多地方说到诸子“著书”，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82、183页。
- [6] 参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20页。
- [7]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大徐本，314页下；后面简称此书《说文》），采取的是广义的立场。
- [8] 参钱存训《书于竹帛》第4次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71页。朱德熙《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又《朱德熙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43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